

中国传统哲学史方法发微

田 文 军

作 者 田文军，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430072

关键词 哲学史方法 批判方法 考辨方法

提 要 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有待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进步。考察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是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研究的重要前提。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主要表现为：秦汉时期的批判方法和明清时期的考辨方法。

方法是科学的灵魂。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与这门学科相应的方法，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如此。对中国传统的哲学史方法作一些回顾和思考，将有助于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完善和发展，也将有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创新。

一 中国哲学史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

在我们加深对中国哲学史方法探讨的时候，黑格尔关于“方法就是对于自己内部自己运动形式的觉识”；“哲学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①的论断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依照黑格尔的理解，方法实际上是人们对事物内在运动形式的理解和运用，方法的内容应当同对象自身的运动形式关联。人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有程度、层次的不同，由此而形成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系统性差别和有效性差别，并不能否定黑格尔对方法的事理方面的根据的肯定。黑格尔正是出于对方法的事理根据的理解，才认定“哲学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强调科学方法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黑格尔的这种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思考中国哲学史方法，首先必须肯定中国哲学史方法是它自己的方法，在探讨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发展时，应当以考察中国传统的哲学史方法为前提和基础。

考察中国传统的哲学史方法，必须克服在哲学史方法探究中轻视传统的倾向。当今学术界议论哲学史方法，大都离不开结构、系统、解释之类的话题，视线多在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历来是不注意方法的。其实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来看，中国哲学不仅有其内在的理论系统，而且有其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方法传统。中

国古代的哲学家重视“立德”，但并不否定“立言”。注意“立言”，不可能不注意“立言”方法。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方法的概念是出现得很早的：“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者可得而和也。此者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谓之方，不中吾方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②这种量度方行之法当是方法的本义。后来方法被引伸演绎出一般的办法之义仍与方法的本义相关。在中国文字中，方与法是可以通用的。方字不仅可表示方向、区域、品类，而且可以表示义理。定规。方法作为人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办法，本身应有事理的根据。哲学史研究所依凭的定准、原则，正是哲学史的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于具体的“立言”方法也是很重视的。孟子提倡“知言”。主张对于偏激的言论弄清其不全面，对过头的言论弄清其失误，对邪恶的言论弄清其所背之理，对于隐讳的言论弄清其理屈之处。这种“知言”，实际上讲到了“知言”的方法。从方法概念的形成和孟子一类古代思想家对“知言”方法的论释，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哲人的方法意识。那种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领域轻视传统的观念是背离史实的。我们只有依据历史本身，肯定和清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形态，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发展。

二、秦汉时期的批判方法

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方法在历史上都是以非独立的形态存在的，中国哲学史同一般学术思想史混而未分，中国哲学史方法也同一般学术思想史方法混而未分。但是，混存于一般学术思想史中的中国哲学史和混存于一般学术思想史方法中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先秦时期的哲学史方法主要是以荀况“解蔽”方法为代表的批判方法。这种方法反对学术思想的片面性，以批判否定对立的学术观念来确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为特征。荀况认为事物是多样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常常会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产生片面，这种片面实即是“蔽”。荀况将形式多样的认识片面性视为“心术之公患”，反对在学术上“蔽于一曲而于大理”。荀况曾“非十二子”，评析先秦诸子之学，评析方法即是指斥诸子学术思想上的片面性。

在荀况看来，“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③其要害都在于片面性。荀况将学术上的片面视为“天下之害”，主张“息十二子之说”。哲学的本性即是求真。为了真实，必须批判违背真实的各种思想学说。荀况“非十二子”的批判方法不仅使他在一个较高的认知层面上总结了先秦的诸子之学，也使他的《非十二子》之类的著作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哲学史性质的著作，使他的批判方法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哲学方法和哲学史方法。

在荀况之后，以“解蔽”为目的和内容的学术批判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韩非子》中评析儒、墨二家，批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具体地指斥了儒墨之学的矛盾和儒家后学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并得出了“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④的结论。《韩非子》一书对儒墨之学的批判，正是其用以建立法家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韩非子》的《显学》《五蠹》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使《韩非子》中的这两篇文章也具有哲学史著作的性质。《庄子·天

下》也是一篇具有哲学史性质的著作。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天下》篇明确地提出了“方术”与“道术”的观念。“方术”是一般具体的学问,“道术”是具有普遍意义洞悉本原的学问。《天下》篇正是以“方术”和“道术”的观念辨析先秦时期不同思想系统的旨趣,批判各家之学的片面性。认为由于“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家之学囿于“一察”而失之全面,使“道术”由于各家的“一察”而遭到了支解。

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墨家钦羨追求“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但是墨家立意虽好,其言行却不符合多数人的愿望,因而并不合于“道术”。彭蒙、田骈、慎道追求“公而不当,易而无私”,主张“弃知去己”,以求解脱。但慎到之道被人认为是“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也不合于古之“道术”。名家一派的理论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惠施多方,……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公孙龙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弱于德,强于物”,也不合于“道术”。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唯老庄之学博大精深。因为老庄之学“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以道观物本是庄学的方法。庄周“齐物”“逍遥”的观念即是以道观物的方法确立起来的。《天下》篇中以“道术”“方术”的观念评断诸家学术得失,这是将庄周的观物之法转换为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确立一种原则的前提下,辨析各家学说,肯定老庄之学,仍不失批判与否定的方法特征。尤为可贵的是《天下》篇中为批判各家,还保留引述了不少学派具体的思想资料,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古人的学术方法,而且在哲学史体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

中国学术到汉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研探学术问题的方法意识更强了。从哲学史方法的角度来看汉代典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尤其是其中的《要略》篇。《要略》篇的主旨是要对《淮南子》全书内容进行概略的评述。这种评述实际上论及了学术方法问题。《淮南子》中有《真训》。是开始,真是真实。《要略》篇论及《真训》时说:“真者穷逐终始之化,赢 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生死之形。”使人“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这种评述,不止是对“真”的诠释,实际上也论及了“真”的方法。《淮南子》的《论训》是“博说世间古今得失”,《诠言训》则是“就万物之指以言其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论”和“诠言”本身即是方法。《要略》中说“论者……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诠言者……善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这不仅指出了《论训》与《诠言训》学术旨趣的差别,实际上也指出了二者方法的不同。可以说《淮南子·要略》中论及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方法,在方法上推重系统性、多样性。特别是《要略》中说《齐俗训》“通古今之论”的观念透露了一种强烈的史学意识,“通古今之论”的重要途径即是研究学术思想史、哲学史。这对于我们理解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有启发的。

从哲学史方法的角度来看,汉人的另一成就是明确地形成了“六家”的观念。司马迁为先秦诸子列传时,将孟荀合传,老庄申韩合传,即不仅记述了各家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而且留意到了各家学说总的风貌与特征,表明了他对“六家”之学旨趣的理解,也表明了他对其父司马谈在学术研究中的归类方法的领悟和运用。

总的讲,秦汉时期哲学史虽未独立成科,但人们研探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的同异、旨趣、思路,评断各家学说的得失,已开始注意和形成研究学术思想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不同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归类。批判的方法中蕴含着分析,归类的方法则蕴含着综合。汉

三、明清时期的考辨方法

• 12°

。《 》，考辨理学学脉源流的著作已有周汝登的《 》
《 》，但黄氏对二书都不甚满意，周
、 “ ”。 ，加之
周氏从禅学的立场评析诸家，对各家学术的旨趣不能实际地评断，所以黄宗羲说周氏之书
“ ”。 《 》
《 》 : “ ，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
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 、
，更注意学术史研究的方法。
。 ，思想家们学术观念的差别源于其对事理的不同理解。 “ ，正
以见道体之无尽也 ”^⑥ ，人心万殊，这是正常的。 ，在总体上不宜
“ ”，拘泥于一种学术标准 “
，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⑦ 。
 “ ”，对某一思想家的理论 “
”，真正把这一家家学中的精华发掘整理出来。 “
别其源流”^⑧。 《 》 : “
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 ，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 ，
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 ，
岂是学问!”^⑨ ，对学者的真知自得之见进行独立的
的辨析，以见其得失，是学术史研究中应有的追求。 ，反对人云亦云，才
有学术的发展，才有学术史研究的发展 ，即是他在
《 》 《 》
，在很大的层面上应归功于他所主张和使用的学术研究方法。
，清代还出现过《 》《 》 ，乃
至于民国时期还有《 》
。 《 》
、 、 、 ，在方法上讲 “ ”、“ ”，主张
理论与史料一致，反对治史中 “ ”。 《 》 “
考镜源流”。 ，也有方法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章氏 “ ，考镜源流”
。
。 《 》
《 》
，晚清学
术方法有今古文之别，这种差别实是研究精神的不同 ，贱演绎而尊归
纳，后者能够在学术问题上大胆怀疑解放，是 “ ”，这两种精神各有自身的价值
。 《 》
: “ ，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新研究之方
。 13°

，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 ’，即其人也。”

，并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 ”“ ”“ ”“ ”“ ”

。 ，表明了他自己对学术方法的看重 《 》
《 》 “ ”，实即是他理解的治学方法

，尽量吸收外来文化，又不妄自菲薄，轻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

“ ”，专志于学问，深入领悟到学问的价值在“ ”“ ”“ ”“ ”，同时也要善于客观地评断古人学术上的片面，用新的学术方法对中国固有文化分科整治，“ ”，存其真”，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梁启超认为随着文化的发展，治学不宜象古人那样包罗万象，只有有所割弃才会有所专精，在学术研究中应“ ”，分业自治”。 ，治学不能只求“ ”，而应不厌辩难，“ ”，一面仍尊人所学”，这样才有学术的繁荣发展 《 》

《 》 《 》系统地诠释史学的意义、 、 ，以及史料的鉴别考校方法 “ ”，提倡客观科学地研究历史，主张史学研究应有益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却未能写成独立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梁氏主张的学术方法虽可归属于传统的哲学史方法范围，毕竟不是独立的中国哲学史方法

。 ，历史上以批判方法和考辨方法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仍然是独立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中的基本内容 ，决不能忽略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历史形态和历史传统

：

① : 《 》，第 94— 95页。

② 《 》。

③ 《 》。

④ 《 》。

⑤ : 《 》

⑥⑦⑧ : 《 》

⑨ : 《 》

(责任编辑 严 真)